

亲近还是疏离？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类型分析

——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崔 烨 薛小怡

【内容摘要】在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代际关系对农民工家庭成员的生活福利具有重要影响。类型学方法是描述复杂多样家庭关系的有用工具,然而目前鲜有对中国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多样性的类型学研究。文章利用2013年12月在中国深圳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使用潜在类别分析的方法,发现了农民工家庭中存在紧密型、远但亲近型、近但有间型与疏离型等四种关系类型,其中最具传统大家庭特征和强凝聚力的紧密型关系仍是农民工家庭中最普遍的关系类型,但已深刻地打上了城镇化烙印,反映了传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传承与变迁特征;远但亲近型关系反映了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外出务工子女远距离赡养父母的努力,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成为维系家庭代际关系的新的重要纽带。

【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关系类型;代际团结;潜在类别分析

【作者简介】崔烨,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薛小怡,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陕西西安:710049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 Migrant Famili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A Typological Analysis

Cui Ye Jin Xiaoy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ass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ch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welfare of family member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ypological methods provide a useful tool to depict complex and diverse family relations, yet there are few typological studies on divers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families.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in 2013, this paper, employing latent class analysis, reveals four type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rural migrant workers' families: tight-knit, near but emotionally-detached, distant but emotionally-close, and detached ties. The tight-knit tie,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aditional extended family and of strong cohesion,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in rural migrant workers' families, but it has been deeply branded with the mark of urbanization, reflecting continuation and change of traditional rural family relations. The distant but emotionally-close tie reflects the effort of out-migrant children who support their parents over a long distance, with parent-child emotion growing into an important new bond maintaining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

Key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s, Typ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Latent Class Analysis

Authors: Cui Ye is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Jin Xiaoyi is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编号:13&ZD044)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编号:2012BAI32B07-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5亿,其中,以在城市打工为目的的外来农村户籍人口即“农民工”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4)。大量农村成年子女的外流加速了农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农村劳动力外流在客观上拉大了农村成年子女与留守农村的老年父母的居住距离,对传统强凝聚力的家庭代际关系构成挑战。与此同时,以孝道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家庭观念正遭受个人主义西方家庭文化的冲击,亲子间平衡的代际关系已经被打破(郭于华,2001),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和睦团结面临挑战。社会文化变迁等非经济因素侵蚀着传统的家庭规范,使得作为“社会细胞”的中国家庭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么,庞大农民工群体与其老年父母代际关系的现状如何?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的代际关系又如何被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和异于传统文化的环境所影响?对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总结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有助于全面认识当前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及矛盾性,有助于及早把握可能诱发的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危机,对于农民工家庭成员特别是老年父母的生活福利和家庭关系的团结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代际关系包含诸多方面。代际团结模型把代际关系区分为六个方面的要素:结构、联系、情感、一致性、功能和规范(Bengtson and Schrader,1982)。类型学方法可以抓住家庭关系不同方面之间的联系、识别家庭关系的潜在结构,是描绘复杂多样的家庭关系的有用工具(Guo, Chi and Silverstein, 2012)。但是现有家庭关系类型学的实证研究很少,已有研究也主要关注代际情感与功能这两个团结维度,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尚未可知。本文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来探析中国农民工家庭多维代际关系的潜在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1 文献综述

1.1 代际关系的多维性

代际团结模型(Bengtson and Schrader,1982)是研究家庭关系多样性的理想框架,已经指导了许多关于成年期代际关系的研究(Atkinson、Kivett and Campbell,1986; Lee、Netzer and Coward,1994; Starrels et al. ,1995,等等)。代际团结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含六个亲子互动的不同维度,即代际结构(影响互动程度的如地理距离之类的因素)、联系(互动活动的类型和频率)、情感(感情亲近度、紧密性)、一致性(意见和价值观上的共识度)、功能(支持和帮助上的交换)和规范(家庭义务的强度)。

代际关系的多维度通常是相互依赖的。例如,地理接近性作为家庭代际互动的机会结构将会增强或限制联系和资源交换的频率和类型(Bengtson and Roberts,1991)。代际之间的价值共识与家庭中积极的关系氛围相关,较强的价值观一致性有助于促进积极的情感和相互支持(Albert、Ferring and Michels,2013)。亲近的情感关系有助于促进代际之间频繁的联系(Bengtson and Roberts,1991)和切实的支持(Coble、Gantt and Mallinckrodt,1996)。规范可能是亲子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它影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频率、情感(Bengtson and Roberts,1991)、地理距离和支持行为(Lin and Yi, 2011)。这些发现表明,代际关系的维系和发展是由代际关系的各个维度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来联合推动的。

1.2 代际关系类型

尽管代际关系的多个维度相互影响,对代际关系多维本质的认识不断加深,但是大多数研究只关注代际关系各个离散的维度、很少同时研究代际团结的多个维度,忽视了不同维度之间的潜在联系。其原因可能在于,家庭代际之间的团结或者凝聚力并不是各个维度累加的结果,而是从不同维度里构建出的类型(Silverstein and Bengtson,1997)。也就是说,代际团结的各个维度是不能简单相加的,并因此而未形成一个单一的概念(Atkinson、Kivett and Campbell,1986)。这也显示出类型学分析在描述

家庭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上比单一的累加模型更具优势(Mangen, 1995),能够更好地反映家庭代际关系的多样性。

目前关于代际关系类型分析的实证研究较少而理论探讨相对较多(Guo、Chi and Silverstein, 2012),对现有代际关系类型的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用数据来发展和验证代际关系类型的实证研究始于美国(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7),之后也被用于其他国家,如英国(Chan, 2008)、德国(Steinbach, 2008; Ferring et al., 2009)、荷兰(Van Gaalen and Dykstra, 2006; Rooyackers, Valk and Merz, 2014)、韩国(Park et al., 2005)以及一些跨国家的比较研究(Silverstein et al., 2010; Dykstra and Fokkema, 2011)。依据关注的代际团结维度的不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代际情感和功能性交换。关于家庭关系情感方面的研究,已经在数个国家发现了稳定的关系类型:友好型(Amicable)、礼貌/情感疏离型(Civil/Emotionally detached)、不和谐型(Disharmonious)与矛盾型(Ambivalent)(Ferring et al., 2009; Silverstein et al., 2010; Steinbach, 2008)。在功能性交换方面,代际关系则随交换的本质(如,社交型、情感型、互惠型)(Park et al., 2005; 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7; Van Gaalen and Dykstra, 2006)、程度(如,低水平、高水平)(Chan, 2008)和支持交换的主要方向(如,向上、向下)(Dykstra and Fokkema, 2011; Guo、Chi and Silverstein, 2012; Rooyackers, Valk and Merz, 2014)而变动。

从相关研究来看,不同的团结指标是利用潜在类别分析形成各种关系类型的前提和基础,团结指标的类型和数量都会对关系类型产生重大影响(Van Gaalen and Dykstra, 2006; Park et al., 2005; 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7)。然而现有研究似乎有所偏离,更多地关注情感(Ferring et al., 2009; Silverstein et al., 2010; Steinbach, 2008)或者功能性交换(Park et al., 2005; Van Gaalen and Dykstra, 2006; Chan, 2008; Dykstra and Fokkema, 2011; Rooyackers, Valk and Merz, 2014)的维度,而其他团结维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在最近一项对韩国的研究中,Park et al. (2005)使用居住安排、规范和三项支持交换的指标来分析中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的关系类型,这显然忽略了包括情感维度在内的代际关系的其他方面的显著特征。仅研究这些维度可能导致误导性的结果和对代际关系有偏的理解,无助于更加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代际关系的结构。因此,使用更加综合全面的团结指标来构建关系类型是必要的,以此来考察家庭代际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传统的儒家孝道规范面临现代化的冲击,特别是乡城流动对农民工家庭的代际互动产生重大影响。目前有关中国农村老年人代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家庭代际支持,分别从子女视角和父母视角进行分析(张文娟, 2004; Cong and Silverstein, 2011; 左冬梅、李树苗、吴正, 2012)、探索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年龄模式(Chen, 2005; 左冬梅、李树苗、吴正, 2012)和代际支持类型(熊波、石人炳, 2014),证实了子女和老年人性别(张文娟, 2004; Li et al., 2004)、婚姻形式、居住安排和家庭结构(Li et al., 2004; Chen, 2005; 靳小怡、郭秋菊、崔烨, 2014)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基于代际团结理论、从多个维度全面分析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类型的研究还很少,更鲜有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类型的研究。

目前仅有的一个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结构的研究(Guo、Chi and Silverstein, 2012)通过对安徽省农村老年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5种农村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类型,即紧密型(tight-knit)、近但不和谐型(nearby but discordant)、远且不和谐型(distant discordant)、远但互惠型(distant reciprocal)及远但向上型(distant ascending);远但向上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成年子女对其父母的强烈孝道,远但互惠的关系反映大规模乡城迁移背景下中国农村合作互利的亲子关系。Rooyackers, Valk and Merz(2014)比较了在荷兰的移民家庭与荷兰当地人家庭中的母亲—子女关系,发现这些家庭中存在5种类似的关系类型,即3种全互赖型(full-interdependence: 互惠互赖型、向上互赖型、向下互赖型)、情感互赖型(emotional-interdependent)和独立自主型(independent),荷兰家庭更多地具有向下互赖和情

感互赖的特征,而全互赖型代际关系在移民家庭中更为盛行。对于这两项研究,虽然前者是考虑到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中国研究,但是对当前大规模的人口乡城流动因素考虑不足,更未能以农民工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后者关注的虽是移民的家庭代际关系,但又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背景相差甚远,农民工在乡城之间的流动不似移民跨国流动那样面临文化适应上的巨大差异。

1.3 代际关系类型的影响因素

代际支持是代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有关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他们同样会对整体的代际关系类型产生影响,需要在分析时予以考虑。这些因素包括子女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代表子女供养父母能力的社会经济因素(如,子女的教育、职业、经济状况等);父母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父母的需求和资源(如,教育、健康状况、收入)。同时子女的孝道观念、流动经历和流动时间等流动特征(张文娟,2004;Cong and Silverstein,2011;左冬梅、李树苗、吴正,2012)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本文中,我们将在以下方面拓展代际关系类型的研究:首先,在研究代际关系类型时,使用更加全面的团结指标,力图更加准确地反映代际关系的全貌、更加综合地把握代际关系的本质。其次,探索中国情景下的家庭代际关系类型,特别关注于农民工家庭关系结构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现状。利用包含六个维度的代际团结模型,我们首先检验农民工家庭中多维家庭关系的潜在结构,之后检验农民工及其父母的人口社会学特征与流动因素是如何影响得到的关系类型的。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的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深圳市地处经济发达的中国东南沿海,长期以来一直是华南地区最主要的人口流入地,在1062.89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仅占29.21%,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4),流动人口来源地包括东南地区的主要省份和众多内陆城市。P区是受到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辐射的卫星城,大量劳动力的涌入使得P区的人口结构发生改变:P区2009年总人口数为54.6万人,其中非户籍人口51.3万人(深圳市P区社会建设局,2010),并且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主,是典型的农村流动人口聚居区。因此,P区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理想调查地。本次调查的对象为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半年以上、目前在深圳P区生活或工作的16岁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调查不仅询问农民工的个人信息,同时询问农民工的父亲和母亲的个人信息以及分别与父亲和母亲的代际关系情况。

为了最大限度抽取到P区的各类农民工样本,本次调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抽样方法:首先,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在所有23个社区散居的农民工,由调查员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的面访;其次,针对聚居的农民工主要是工厂里的农民工,本调查采取了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四个工厂。本次调查最终获得2071个合格的农民工样本,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达到62.46%,省内跨市和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例约为3:7,符合P区农民工的基本分布^①,此次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课题组在调查执行和数据录入的各个环节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来保证数据质量。对数据质量的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虽然存在一定误差,但均在可接受的水平上,数据质量较高。

本文为研究代际关系,所分析的样本应该是至少有一个健在父母的农民工样本。因此,我们从总体样本中按以下步骤选取符合条件的样本进行分析:首先,将农民工与一对父母的“一对二”的数据结

^① 根据深圳市2009年的就业登记信息系统数据,在P区登记就业的22.3万劳动力人口中,25~34岁年龄段人口占37%;19~24岁年龄段人口占30%;35~44岁年龄段人口仅占25%(深圳市P区社会建设局,2010)。

构拆分为农民工与父亲或母亲的“一对一”的配对数据(4142个);其次,删掉父亲或母亲去世的样本(482个);再次,剔除缺失构建代际关系类型的相关信息的样本(163个);最后,剔除缺失农民工个人特征信息与父母信息的样本(547个)。最终,进入本文分析的样本包括1633个农民工和2950个父母(1431个父亲和1519个母亲),其中,87.08%农民工的父母均健在,3.80%的农民工只有父亲健在,9.12%的农民工只有母亲健在。

2.2 变量测量与样本特征

代际团结的各个维度由七个二分指标来测量:地理接近性、联系频率、看法相似性、情感亲近度、孝顺父母度、提供经济帮助与获取经济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功能性团结通常是由双向流动的帮助来测量的。同时为了降低交互分类表的稀疏性(sparseness),所有的团结指标都被处理为二分类的变量(Dykstra and Fokkema, 2011; Rooyackers, Valk and Merz, 2014; 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7)。除了省内跨市流动外,跨省流动更是包括深圳市在内的中国东部地区人口流入的主要方式(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4),因此地理接近性由农民工与父母是否居住在同一省份来测量,1=是,0=否。联系频率编码为1=至少每周联系一次,0=少于每周一次。看法相似性编码为1=看法较相似,0=较不相似。孝顺父母度的编码为1=较孝顺父母,0=较不孝顺。经济支持指在调查前12个月里农民工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相互提供现金和实物支持的情况,1=是,0=否。情感亲近度由以下三个问题测量:“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父亲/母亲(感情上)亲近吗?”“总的来讲,您觉得自己和父亲/母亲相处得好吗?”与“当您想跟父亲/母亲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他愿意听吗?”答案采用三级测量,将各问题得分加总,分值范围为0~6,得分越高表示亲子情感关系更好。在本文中,与父亲的情感亲近度量表信度 $\alpha=0.6540$,与母亲的为 $\alpha=0.6345$ 。考虑到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亲近度上典型的正偏态(Ward, 2008),以5分作为节点把结果二分化处理(Guo, Chi and Silverstein, 2012),最终编码1=情感较亲近,0=较不亲近。七个团结指标的分布见表1。

表1 测量代际团结各个维度的项目分布(N=2950)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Items Measuring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团结指标	%
居住在同一省份	39.46
至少每周联系一次	72.07
看法较相似	40.54
情感较亲近	64.68
较孝顺父母	67.90
提供经济帮助	83.66
获取经济帮助	43.05

农民工个人的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孝道观念、子女照料责任。其中,由于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仅占6%,初中占40%,高中及以上占54%,因此在模型分析中将前两项合并为“初中及以下”。职业分为普通劳动者(包括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和非普通劳动者(除普通劳动者之外的其他劳动者),前者占比为73%。孝道观念由六个问题上的赞同度测量:“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活动应该让父母知道,并让父母参与进来”、“如果子女住的地方离父母较近,子女每周至少应该看望父母一次”、“为了给父母提供帮助,已婚的子女住的地方应该离父母较近”、“有时为了给年老父母提供帮助时,子女是可以牺牲一些自己孩子的利益”、“老年父母可以依靠

子女来帮助他们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与“父母应该对子女的帮助提供一些回报,如做家务,带小孩等”。答案采用五级测量,将各问题得分加总,分值范围为0~24,得分越高表示农民工的孝道观念越强。在本文中,孝道观念量表信度 $\alpha=0.6036$ 。子女照料责任由是否有未成年子女来测量。父母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健康。其中,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占51%,初中占33%,高中及以上仅占16%,因此在模型分析中将后两项合并为“初中及以上”。父母的职业为农林牧渔人员的占38%。农民工的流动特征包括来源地、流动经历和流动时长。有关父母与农民工个人特征及流动特征的变量具体分类见表4及注解。

在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中,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0.31岁,女性农民工占54%,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时间平均达到9.17年,跨省流入深圳市的占70%,其中来自东部的占36%,中部的占41%,西部的占23%。农民工的孝道观念得分平均为17.31。58%的农民工有未成年子女,34%的农民工的父辈在其未成年时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绝大部分农民工的父母居住在农村(即“留守老人”),仅有9%的农民工的父母随迁到城市与他们同住。农民工父母的平均年龄为55.94岁,其中母亲占51%,父母离异或丧偶者仅占2%,还有4%未婚;父母的健康状况普遍良好,不能自理的仅占2%,基本能自理的占13%,可以做家务的仅占21%,可以做农活或工作的占64%(模型分析中将前三项合并为“不能干农活”)。

2.3 分析方法

从以往相关研究来看,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是利用不同团结指标生成各种关系类型的有效工具(Rooyackers、Valk and Merz, 2014; 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7)。本文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来考察基于代际团结指标的农民工与其父母的代际关系类型。潜在类别分析是用来探讨类别外显变量(categorical manifest variables)背后的类别潜在变量(categorical latent variables)的一种统计方法,允许研究者假定一组未观测的潜在类别来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联系,即被称作局部独立性的条件(Clogg and Goodman, 1984)。潜在类别分析中有两类估计的参数: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ies)和潜在类别概率(latent class probabilities)。条件概率反映了观测指标对每个潜在类别的分配,代表着观测变量与每一潜在类别之间的联系程度,相当于因素分析中的因素载荷。潜在类别概率表示潜在变量的各个类型的分布,对于描述一个群体内各类型的比例(prevalence)、比较群体内各类型的盛行率都是有用的。

在识别代际关系类型时,我们使用Mplus 6.11来分析团结的7个二分指标交叉分类所形成的128种($=2^7$)应答方式。我们以只有一个类别的潜在类别模型为基准模型,之后逐步增加类别数目,进行适配性检验以决定最佳模型。选取最佳模型的拟合度指标有:似然比卡方检验统计量(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 test statistic, L^2)和BIC指标(Baysian informal criterion statistic)(Raftery, 1986)。 L^2 检验理论模型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差异性,显著性水平越低表示模型对数据拟合越好。BIC用于在合理但竞争的一些模型中挑选拟合最好的模型;BIC越小,模型拟合得越好。

在分析的第二步,为了检验农民工个人、父母特征及流动特征与亲子关系类型之间的联系,我们对得出的每种关系类型分别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农民工家庭中的代际关系类型

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五个潜在类别模型的适配检验结果见表2。对于所有五个模型, L^2 统计量都是显著的。尽管似然比卡方值可以指出合适的类别数目,但是我们并没有以此作为唯一的选取标准,因其不具有通常的大样本卡方分布,且获得的P值可能并不准确(Nylund、Asparouhov and Muthén, 2007)。作为替代,在选择最佳模型时更多地考虑BIC指标。在前四个模型中,每增加一个类别,BIC指标的值均在减小,表明模型适配度相对提高;继续增加为五类别模型时,BIC指标的值开始增加,表

明四类别模型是最佳的。因此,我们最终选取与数据拟合最好的四类别代际关系模型。

表 2 代际关系潜在类别分析模型适配检验结果(N=2950)

Table 2 Latent Class Model Fitting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类别数目	L ²	df	P	BIC
1	963.89	120	0.000	25685.35
2	385.55	112	0.000	25170.93
3	319.92	104	0.000	25169.21
4	240.94	96	0.000	25154.15
5	197.74	88	0.000	25174.87

注: L² = 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 BIC = Bayesian Informal Criterion。

表 3 给出了四类别代际关系模型的潜在类别概率与条件概率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基于这些概率的模式,我们对各个类别进行命名以描述四种关系类型:(1)紧密型(54.81%), (2)近但有间型(17.73%), (3)远但亲近型(12.88%), (4)疏离型(14.58%)。

表 3 四类别代际关系模型的潜在类别系数(N=2950)

Table 3 Latent Class Coefficients for Four-Class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变量	第 1 类		第 2 类		第 3 类		第 4 类	
	紧密型	近但有间型	远但亲近型	疏离型	远但亲近型	疏离型	远但亲近型	疏离型
居住在同一省份	0.46 ***	0.62 ***	0.00	0.27 ***				
至少每周联系一次	0.83 ***	0.81 ***	0.67 ***	0.27 **				
看法较相似	0.60 ***	0.18 ***	0.40 ***	0.14 **				
情感较亲近	0.82 ***	0.45 ***	1.00	0.00				
较孝顺父母	0.94 ***	0.39 ***	0.59 ***	0.40 ***				
提供经济帮助	0.90 ***	0.82 ***	0.76 ***	0.74 ***				
获取经济帮助	0.49 ***	0.55 ***	0.26 ***	0.26 ***				
潜在类别概率	0.55	0.18	0.13	0.15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得到的四个类型代表了当代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典型类型。第 1 种类型即紧密型,象征着最具凝聚力的亲子关系,农民工和父母之间联系频繁、看法相似、情感亲近、孝顺父母和具有较强的家庭规范(孝顺父母)和经济交换,同时虽然在空间临近性和从父母获取经济帮助上相对较低,但也有将近一半的可能性(分别为 46% 与 49%)。第 2 种类型即近但有间型,代表着农民工与父母很可能都住在同一省内且每周都联系,但是看法较相似和情感亲近的可能性较低,对父母的孝顺度也是最低的(39%);同时农民工给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较高,但是在四种关系类型中也是最可能从父母处获取经济帮助的,经济帮助向上净流动可能性的幅度(82% - 55% = 27%)最小。第 3 种类型即远但亲近型,与近但有间型类型相比,农民工的父母很可能居住在省外、每周联系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但是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看法相似、情感亲近、孝顺父母,并且从父母处获取经济帮助(26%)的可能性最低、经济帮助向上净流动可能性的幅度(76% - 26% = 50%)最大,从而表现出最显著的向上净流动的特征。第 4 种关系类型即疏离型,代表了凝聚力最差的亲子关系类型,在所有的团结指标上均处于很低的水平。

3.2 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类型的影响因素

利用农民工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及流动特征预测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四种潜在类别的 Logistic 回

归结果见表4。农民工的性别影响关系类型,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紧密的代际关系而不大可能有近但有间的关系。年龄小的农民工可能与父母有远但亲近的关系,而年龄越大则更可能与父母拥有紧密的代际关系。已婚的农民工不大可能与父母有疏离型关系而更可能有远但亲近型关系。孝道观念越强的农民工越可能与父母有紧密型关系,同时越不可能有疏离和近但有间的关系。有未成年子女的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疏离的关系而不可能有紧密的关系,表明农民工抚养自己子女、构建起自己的小家庭可能会弱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表4 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四种潜在类别的 Logistic 回归(N=2950)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of the Four Latent Classe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紧密型		近但有间型		远但亲近型		疏离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个人特征								
女性(男性)	0.21 **	0.08	-0.24 *	0.11	0.07	0.12	-0.19	0.11
年龄	0.02 *	0.01	-0.03	0.02	-0.04 *	0.02	0.01	0.02
已婚(未婚、离异或丧偶)	0.35	0.22	-0.21	0.30	0.69 *	0.31	-1.59 **	0.52
高中及以上(初中及以下)	0.16	0.09	-0.20	0.11	-0.19	0.13	0.10	0.12
普通劳动者(非普通劳动者)	0.07	0.09	-0.13	0.12	0.06	0.14	-0.05	0.13
月均收入(ln+1)	0.05	0.03	-0.02	0.04	-0.04	0.04	-0.04	0.04
孝道观念	0.11 ***	0.01	-0.09 ***	0.02	0.03	0.02	-0.12 ***	0.02
有未成年子女(无未成年子女)	-0.44 *	0.22	0.51	0.30	-0.45	0.31	1.18 *	0.52
父母特征								
女性(男性)	0.16 *	0.08	-0.06	0.11	0.13	0.12	-0.37 **	0.11
年龄	-0.01	0.01	-0.01	0.01	0.04 ***	0.01	-0.00	0.01
已婚(未婚、离异或丧偶)	0.10	0.15	-0.14	0.20	0.61 *	0.27	-0.42 *	0.20
初中及以上(小学及以下)	0.20 *	0.08	-0.23 *	0.11	0.04	0.13	-0.20	0.12
农林牧渔业人员(非农林牧渔)	0.21 **	0.08	-0.54 ***	0.12	-0.16	0.12	0.28 *	0.11
年收入(ln+1)	0.04 **	0.01	-0.03	0.02	-0.03	0.02	-0.01	0.02
可以干农活/工作(不能干农活)	0.08	0.09	-0.21	0.12	0.21	0.14	-0.08	0.13
流动特征								
来源地^a(东部)								
中部	-0.11	0.09	-1.35 ***	0.12	1.88 ***	0.20	0.74 ***	0.13
西部	-0.03	0.10	-1.42 ***	0.15	2.17 ***	0.20	0.33 *	0.16
流动经历^b(父辈无流动)								
父辈有流动	-0.00	0.08	0.36 **	0.11	-0.46 ***	0.13	-0.01	0.12
外出务工时长 ^c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0	0.01

注:a. 来源地即户籍所在地,东部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中部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b. 流动经历指父母在自己18岁之前有无外出务工经历;c. 流动时长指截止调查时点出来打工的年数。

括号内为参照项;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从父母的特征来看,相对于父亲,母亲不大可能与子女有疏离的关系而更可能有紧密的关系。年龄越大的父母越可能与农民工有远但亲近的关系。父母的婚姻状况也与关系类型相关,已婚的父母不大可能与农民工有疏离的关系,而更可能有远但亲近的关系。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父母,

初中及以上水平的父母不大可能与农民工有近但有间的关系,同时更可能有紧密的关系。从事农林牧渔业的父母更可能与农民工同时有凝聚力最强和最弱的关系即紧密型和疏离型关系,而不大可能有近但有间的关系。父母的收入越高,越可能与农民工有紧密的关系。

本文在农民工和父母的一些共同的特征上取得了和以往研究相一致的发现。首先,我们发现性别对代际关系类型具有重要影响,女性更可能与其他家庭成员有强凝聚力的代际关系,母亲不大可能与农民工有疏离的关系而更可能有紧密关系,女性农民工不大可能与父母有近但有间的关系而更可能有紧密的关系,这验证了女性作为亲属关系维系者角色的重要作用(Aldous,1987)。其次,较年轻的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远但亲近的关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可能形成紧密的关系,反映了农民工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与父母代际关系的变迁;而年龄越长的父母越可能与农民工有远但亲近的关系。再次,婚姻在塑造农民工与父母的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已婚,包括农民工与父母二者的已婚状态,均降低了成为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增加了远但亲近型关系的可能性,即婚姻有助于构建凝聚力更强的代际关系,这与婚姻作为挤出其他社会关系而成为一项贪婪的制度的观点相一致(Coser and Coser,1974)。

从流动特征来看,预期之中的是,较远的地理距离很可能产生具有较弱地理临近性特征的关系类型(如疏离型和远但亲近型),反之则可能产生较强地理临近性的关系类型(如近但亲近型)。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来源地区域对几乎所有的代际关系类型有影响,这除了流动距离的作用之外,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因素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同时,研究发现在18岁之前父母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远但亲近的关系,而父辈流动过的农民工更可能有近但有间的关系。这与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Cassidy,1999)的观点相一致,早期对父母的情感依恋对之后生命历程中外出流动时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没有流动过的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抚养陪伴未成年子女、培养亲子情感,这使得他们即使外出远距离务工,仍保持与父母的亲近情感并向他们提供经济支持;而在未成年时被剥夺依恋关系(父母因流动而未能长期陪伴、培养情感)的农民工即便随后在较近的距离内务工,也会与父母在情感上不甚亲近、出于赡养的义务而向父母提供帮助。

4 主要结论与讨论

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民工家庭成员的福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2013年12月的深圳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探索当代中国农民工与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结构。通过对一系列广泛的团结指标——地理接近性、联系频率、看法相似性、情感亲近度、孝顺父母度、提供经济帮助与获取经济帮助——的潜在类别分析,发现了四种家庭关系类型,并探讨了农民工和父母的个人特征及流动特征对这四种关系类型的影响,揭示了处于社会文化变迁之中的农村外出务工成年子女与留守老人的代际关系如何受到中国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和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本文发现了存在于农民工家庭中的四种代际关系类型。第一,紧密型关系,得名于Silverstein and Bengtson(1997)的研究,是本研究中最普遍的关系类型,表现出具有较强凝聚力的传统大家庭的特征;但在这一类型关系中的农民工与父母的居住临近性较弱,显示了流动对这种紧密结合的传统大家庭的影响。类似紧密型的家庭关系模式在一些西方的研究中已有所报告,虽然因使用的外显变量不同而命名各异,比如“和谐型”关系(harmonious)(Van Gaalen and Dykstra,2006)和“友好型”关系(amicable)(Ferring et al.,2009; Silverstein et al.,2010);对中国农村家庭关系结构的研究中也发现同样的关系类型(tight-knit)(Guo,Chi and Silverstein,2012)。比较不同研究中这种紧密结合的家庭关系形式的盛行率(prevalence)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在本文中有大概55%的亲子关系被归类为紧密型,这一数据与一些欧洲研究(Ferring et al.,2009; Silverstein et al.,2010; Van Gaalen and Dykstra,2006)具有可比性(40%~70%),但是高于Silverstein and Bengtson(1997)对美国家庭的研究

(31%)，也远高于 Guo、Chi and Silverstein(2012)对中国农村家庭的研究(23%)。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中所关注的家庭关系领域不同所致，相对于我们的研究使用较为全面的测量检查了包括情感在内的所有六个团结维度，这些研究特别是大部分欧洲研究仅着眼于情感关系、对情感亲近度的测量方式也不同，中国农村家庭的研究则在团结维度之外增加了对冲突关系的这一关键测量(Guo、Chi and Silverstein,2012)；同时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空间临近性这一关键维度上较低的可能性(46%)远低于其他研究中相应测量的水平(89% in Silverstein and Bengtson,1997; 99% in Guo、Chi and Silverstein,2012)，这种在结构维度上放宽了限制的紧密型关系可能使得其区别于其他研究中的紧密型关系并且成为本研究所发现的最普遍的关系类型。

第二，本文同时揭示了一种代表子女对父母强烈情感与孝行的关系模式，即远但亲近型关系，虽然相隔巨大的地理距离，但是这种类型的农民工和父母之间的情感亲近，经济帮助净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最大。回归结果显示，这种模式与农民工父母的收入或者健康状况无关，即父母的需求并不是导致经济帮助净向上流动的因素，同时孝道观念也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表明很可能是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积极的情感所导致的，从而使之有别于先前的 Guo、Chi and Silverstein(2012)在中国农村家庭中发现的类似的“远但向上型”关系(distant ascending)，其表现出在远的地理距离上子女给父母的向上货币支持的特征，但作者认为这种向上的代际支持反映了强烈的孝道传统而非亲子之间的亲近情感。同时，远但向上型关系因占到中国农村家庭亲子关系的 34% 而成为最普遍的关系类型，但是本文发现只有大概 13% 的亲子关系是远但亲近型，也是本文所发现的最少见的关系类型。相对于正遭受社会变迁的传统孝道观念而言，亲近情感开始浮现并逐渐成为影响代际支持的重要因素。同时这种差距也可能与研究视角有关，中国农村家庭的研究是从父母的视角出发的，而老年父母比子女更倾向于积极地评价代际关系(Giarrusso、Feng and Bengtson,2004)。

第三，与远但亲近型关系相对，本文也发现了 18% 的亲子关系属于近但有间型，其中农民工与父母在空间上的临近性与频繁的联系并没有产生亲近的情感及相似的看法，并且经济帮助净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最低(尽管经济帮助双向流动的可能性均较大)。这类家庭类似于先前研究中识别出的“责任义务型”关系(obligatory)(Silverstein and Bengtson,1997; Van Gaalen and Dykstra,2006)或“近但不和谐型”关系(near but discordant)(Guo、Chi and Silverstein,2012)，其中家庭成员的功能性交换主要地基于责任感而非强烈的积极情感。本文发现近但有间型关系占 18%，略高于西方研究里的责任义务型关系并具有可比性，如在 Silverstein and Bengtson(1997)和 Van Gaalen and Dykstra(2006)的研究中 16% 的责任义务型关系，也稍高于中国农村家庭里 17% 的近但不和谐型关系(Guo、Chi and Silverstein,2012)。远但亲近型和近但有间型关系的存在表明，尽管家庭成员在地理上是分散的，但是在需要时都能及时为父母提供帮助，无论是出于积极的情感抑或强烈的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发展需求和父母的养老保障，也可能预示着当前持续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发展的趋向。

第四，与紧密型关系相对，本文发现的凝聚力最弱的关系类型是疏离型，最能象征孤立分离的家庭(isolated extended family)(Parsons,1949)，无论是在机会结构、功能性交换还是情感亲近度等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均表现最弱。以往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的关系类型，如“自主型”关系(autonomous)(Dykstra and Fokkema,2011)、“独立型”关系(independent)(Rooyackers、Valk and Merz,2014)和“远且不和谐型”关系(distant discordant)(Guo、Chi and Silverstein,2012)。本文发现 15% 的亲子关系属于疏离型，低于美国家庭中的疏离型关系(27%)(Silverstein and Bengtson,1997)和欧洲家庭里的自主型关系(33%)(Dykstra and Fokkema,2011)，这可能表明尽管中国家庭亲子关系也显现出疏离倾向(杨菊华、何炤华,2014)，但是相对于西方家庭中较强的独立性规范，中国家庭仍具有较强的家庭主义倾向；

同时这一数字与在荷兰的移民家庭中的独立型关系(10%)(Rooyackers、Valk and Merz,2014)和中国农村家庭里的远且不和谐型关系(15%)(Guo、Chi and Silverstein,2012)具有可比性,反映了流动背景下不同文化国家里可能存在相似的家庭关系类型。这类不正常且有问题的关系(Silverstein and Bengtson,1997)可能反映了与人口流动相关的挑战。农民工和父母的长期分离以及各自生活不同经济文化环境会导致代际之间情感、价值观认同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从而产生问题、引发家庭关系紧张,这可能对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合和父母的心理福利产生消极影响,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

其次,本文检验了农民工与父母的个人特征及流动特征与关系类型之间的联系,特别地,农民工的孝道规范和父母的个人资源影响着代际关系类型,这也表明关系类型可能是农民工和父母的个人资源与传统孝道规范、现代社会变迁之间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反映农民工供养父母能力特征的教育、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对代际关系的类型没有显著影响,而代表中国传统家庭核心价值观的孝道观念对几乎所有的代际关系均有显著影响,表明虽然传统的强凝聚力的家庭代际关系在当前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更多地展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但是传统孝道价值观而非乡城人口流动带来的职业和收入的转变对农民工代际关系产生影响、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农民工从事何种职业、收入几何,孝道观念越强就越有助于促进代际之间关系的凝聚。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是父母而非子女的教育、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了家庭关系,这与代际风险理论(intergenerational stake theory)(Giarrusso、Feng and Bengtson,2004)所认为的家庭关系中父母比子女更少地受其需求和资源影响的观点相悖;拥有更多资源(如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高)的父母才更可能与子女有紧密的关系,这似乎也反映父母在代际关系中变得弱势。通过再教育、更好地就业参与以及经济能力的改善,持久的城镇化进程给农民工带来了更多收益、提高了家庭地位,而他们的父母对家庭资源的控制与分配权日趋减弱、在家庭中的权威下降,使其在代际关系中处于敏感而弱势的地位,也不利于家庭代际关系的和谐团结。流出地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留守父母的关注,采取家庭互助、社区居家养老等补充传统家庭养老的社会化养老政策举措,缓解成年劳动力流出所造成的农村养老困局;在当前文化变迁之下的传统孝道规范仍发挥巨大作用,流入地政府与社会适当增加对农民工群体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深化传播,也有助于更多地鼓励农民工的孝行、增进农民工家庭成员特别是农民工父母的福利。

总之,本文探索性地研究并揭示了当前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结构。通过使用更加全面的团结指标,我们发现当代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在乡城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已经发生变化,显示出有别于传统高凝聚特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尽管紧密型关系在农民工家庭中仍最为普遍,但已是放宽了地理距离限制的紧密型关系、并且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关系类型,反映了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与妥协,这一发现也证实了包含更为广泛的团结指标来分析关系类型的重要性。本研究的另一重要发现是农民工家庭中存在以亲近情感为主要特征的远但亲近型关系。尽管相对于亲子之间的亲近情感,孝顺规范被认为是传统上连结代际关系的有力纽带,但是可能已遭受当前深远的社会变迁的挑战而导致家庭关系趋弱,而具有亲近情感特征的远但亲近型关系适应此趋势,无论是部分替代抑或重要补充,逐渐成长为重要的关系形式。另外,农民工家庭成员的资源与需求影响着代际关系,而农民工的父母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是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群体。这些发现均揭示了处于社会文化变迁之中的农民工个人的家庭关系已经、并将继续被中国人口乡城流动和传统孝道文化所影响。

当然,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所用样本来自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这些发现是否可以推广到经济发展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家庭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其次,受限于调查对象的流动性,我们难以获得农民工所有其他兄弟姊妹与父母的代际关系信息,从而难以确定家庭关系类型上的一致性。未来的研究中需包含更多子代成员,以更全面地理解农民工的家庭关系结构。再次,为了更加方便地比较不同的研究发现,在研究中使用更加一致的外显变量和测量是有必要的;

同时,尽管我们使用了代际团结的所有六个维度的测量,但是显然还未能抓住功能性团结的所有方面,特别是父母给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这一典型的存在于农民工家庭中的支持交换形式。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4.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4
Floating Population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2014. Report on China's Migran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2014.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2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4.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4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2014. China Family Development Report 2014.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3 郭于华.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 中国学术,2001; 4:221 - 254
Guo Yuhua. 2001. Fair Logic and Its Change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alysis on Old-age Support in Rural Hebei. China Shcolarship 4:221 - 254.
- 4 靳小怡,郭秋菊,崔烨. 转型期的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青年研究,2014; 4:28 - 38
Jin Xiaoyi, Guo Qiuju and Cui Ye. 2014. Rural Family Structure during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Its Effect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Youth Study 4:28 - 38.
- 5 深圳市 P 区社会建设局.“加快提升 P 区劳动力素质”调研报告. 2010
Social Construction Bureau of P District, Shenzhe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Labor Force. 2010.
- 6 熊波,石人炳.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类型的再分析:基于对湖北省两个地区的调查. 人口与发展,2014; 3:59 - 65
Xiong Bo and Shi Renbing. 2014.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Pattern in Rural Elder Famil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From Two Areas in Hubei Province.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3:59 - 65.
- 7 杨菊华,何昭华.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 人口研究,2014; 2,36 - 51
Yang Juhua and He Zhaohua. 2014. Continuity or Change? Chinese Family in Transitional Era. Population Research 2:36 - 51.
- 8 张文娟.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2004
Zhang Wenjuan. 2004.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he Elderly's Family in Rural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Labor Migration. Xi'a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9 左冬梅,李树苗,吴正.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 当代经济科学,2012; 4,26 - 34
Zuo Dongmei, Li Shuzhuo and Wu Zheng. 2012. Age Trajectories of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in Elderly Family of Rural China: Perspective of Adult Children.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4:26 - 34.
- 10 Albert, I. ,Ferring, D. ,& Michels, T. 2013.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 in Luxembourg. European Psychologist 1:59 - 69.
- 11 Aldous, J. 1987. New Views on the Family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Near-elder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 227 - 234.
- 12 Atkinson, M. P. ,Kivett, V. R. ,& Campbell, R. T. 1986.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 Examination of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408 - 416.
- 13 Bengtson, V. L. ,& Roberts, R. E. 1991.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 An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56 - 870.
- 14 Bengtson, V. L. ,& Schrader, S. S. 1982. Parent-child Relations. Research Instruments in Social Gerontology 2:115 - 186.
- 15 Cassidy, J. 1999. The Nature of the Child's Ties. In J. Cassidy & P. R.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s.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 16 Chan, T. W. 2008.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in the UK. Sociology Working Papers,5.
- 17 Chen, F. 2005. Residential Patterns of Parents and Their Married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Life Course Approach.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125 - 148.

- 18 Coble, H. M. , Gant, D. L. , & Mallinckrodt, B. 1996. Attachment, Social Competency, and the Capacity to Use Social Support. In *Handbook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 Family*:141 - 172. Springer US.
- 19 Clogg, C. C. , & Goodman, L. A. 1984. Latent Structure Analysis of a Set of Multidimensional Contingency Tabl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388 :762 - 771.
- 20 Cong, Z. , & Silverstein, M. 2011.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Parents and Migrant and Nonmigrant Son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 :93 - 104.
- 21 Coser, L. , & Coser, R. 1974. *Greedy Institutions: Patterns of Undivided Commitment* 3. New York: Free Press.
- 22 Dykstra, P. A. , & Fokkema, T. 2011.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A West European Typology of Late-life Families. *Ageing and Society* 4 :545 - 569.
- 23 Ferring, D. , Michels, T. , Boll, T. , & Filipp, S. H. 2009. Emotional Relationship Quality of Adult Children with Ageing Parents: on Solidarity, Conflict and Ambival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4 :253 - 265.
- 24 Giarrusso, R. , Du, F. , & Bengtson, V. L. 2004. The Intergenerational-stake Phenomenon over 20 Years. *Annual Review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1 :55 - 76.
- 25 Guo, M. , Chi, I. , & Silverstein, M. 2012.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Rural China: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 :1114 - 1128.
- 26 Lin, J. P. , & Yi, C. C. 2011. Filial Nor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in China's Mainland and Taiwan Reg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 :S109 - S120.
- 27 Lee, G. R. , Netzer, J. K. , & Coward, R. T. 1994. Filial Responsibility Expectations and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 :559 - 565.
- 28 Li, S. , Feldman, M. W. , & Jin, X. 2004. Children, Marriage Form, and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The Case of Songzi. *Research on Aging* 3 :352 - 384.
- 29 Mangen, D. J. 1994. Methods and Analysis of Family Data. In R. Bliezner & V. H. Bedford(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Family*:148 - 178.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30 Nylund, K. L. , Asparouhov, T. , & Muthén, B. O. 2007. Deciding on the Number of Classes in Latent Class Analysis and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Stud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4 :535 - 569.
- 31 Park, K. S. , Phua, V. , McNally, J. , & Sun, R. 2005. Diversity and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Elderly Parent-adult Child Relations in Kore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4 :285 - 305.
- 32 Parsons, T. 1949.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in R. N. Anshen (Ed), *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173 - 201. New York: Harper.
- 33 Raftery, A. E. 1986. Choosing Models for Cross-classific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145 - 146.
- 34 Rooyackers, I. N. , de Valk, H. A. , & Merz, E. M. 2014. Mother-Child Relations in Adulthood Immigrant and Non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 :569 - 586.
- 35 Silverstein, M. , & Bengtson, V. L. 1997.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in American Families 1.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 :429 - 60.
- 36 Silverstein, M. , Gans, D. , Lowenstein, A. , Giarrusso, R. , & Bengtson, V. L. 2010. Olde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Six Developed Nations: Comparis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ffection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 :1006 - 1021.
- 37 Starrels, M. E. , Ingersoll-Dayton, B. , Neal, M. B. , & Yamada, H. 1995.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Workplace: Employees' Caregiving for their Par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 :751 - 762.
- 38 Steinbach, A. 2008.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Ambivalence: Types of Relationships in German Famil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9 :115 - 127.
- 39 Van Gaalen, R. I. , & Dykstra, P. A. 2006. Solidarity and Conflict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Parents: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 :947 - 960.
- 40 Ward, R. A. 2008. Multiple Parent-adult Child Relations and Well-being in Middle and Later Lif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239 - 247.

(责任编辑:宋严 收稿时间:2015-01)